

## 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及启示

周桂银

**内容提要** 冷战时期三种不同等级的行为体,在中间地带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关系,即超级大国的全球性战略竞争、次级大国(力量中心)参与的局部性竞争与缓和、地区大国参与的地区性竞争与合作。中间地带的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其中,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在纵向上贯穿整个冷战时期,在横向上扩展到全球所有地区,而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参与的国际互动仅限于一两个阶段和一两个地区,即阶段性和局部性。冷战时期,中间地带在组成和规模上是不断变动的,中间地带与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之间会发生相互转化,但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在根本上难以撼动冷战两极体制。由于中间地带的变动性、多重性和复杂性,在战略认知上,世界大国应当坚持客观和长远态度,在战略选择上奉行审慎和灵活原则。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冷战 中间地带 超级大国 次级大国 地区大国 战略审慎

中间地带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在不同时代,在世界主要大国或主要力量中心之间,始终会存在一些规模和实力大小不等的中小国家,它们

---

\* 周桂银: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邮编:361005)

通常被称为中间地带(intermediate zone)、中间地区(intermediate region/area)、战略缓冲区(strategic buffer)。但无论是战略的还是战役战术的层次,中间地带不同于一般军事意义上的缓冲地带(buffer zone)。在和平时期,中间地带是大国之间相互争夺和纵横捭阖的政治及战略空间;在战争期间,它们往往会沦为武装冲突的场所和瓜分兼并的对象。近代以来,欧洲的德意志、意大利北部、中东欧(特别是波兰和巴尔干)等地区,以及亚洲的土耳其、伊朗(波斯)、阿富汗、晚清中国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欧洲列强之间的中间地带,对近现代欧亚历史进程的演变发展至关重要。冷战时期,在美苏两大力量中心以外,也存在着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由于美苏关系变化、两大阵营内部分化、非殖民化进程发展及其他重大事态,这个辽阔的中间地带的属性、构成和作用,呈现出相当大的变动性、多重性和复杂性。其中最为显著的现象是,在这个辽阔、复杂、多变的中间地带,超级大国、次级大国与中间地带自身的地区大国之间,形成了三个阶段、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关系。本文试图概要性地考察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丰富而复杂的国际互动图景,展现不同行为体及其对外政策行为的动因和过程,进而指出中间地带国际互动的若干政治及战略含义。

## 一、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含义及特征

关于中间地带概念,国内研究界一般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解和研究的。一是从当代中国外交思想传统出发,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概念的变化和发展,分析这个概念对于相应阶段的中国外交的指南作用以及国际统一战线的实际操作,并由此出发揭示它对当前中国外交实践的适切性或启示。<sup>①</sup>一些专题性的、高水平的案例研究,比较深入而详尽地考察了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提出的中间地带设想以及相应的外交政策行为,剖析三个不同时段的中带概念的含义及其主观性、全局性和战略性,检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根据这个概念而规划和推

---

<sup>①</sup> 两项较早研究,参见: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孙建社、石斌:《从“中间地带”到“世界多极化”: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行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的经验及教训。<sup>①</sup> 这些研究对于厘清这个概念的内涵及变化、政策指向及得失,尤其是检讨它对不同阶段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南作用和实际效果,意义非常重大。二是在一般的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上,论说中外历史和现实中的相关行为体及其中间地带战略,试图从中归纳或提炼出具有普遍适切性的中间地带理论或战略行为模式。这类研究主要从地缘战略视角出发,强调国际政治力量结构及变化(权力转移)、大国关系以及中间地带在地缘战略博弈中的地位和困境。有论者把处于两个或三个大国争夺下的地区和国家称为中间地带,如美苏及美俄之间的中东欧及中东和高加索、中美俄之间的中南亚;也有人直接将欧亚大陆的所谓“断层带”(fault zone)称为中间地带,一般包括中东、高加索和中亚;还有人以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和南北朝时期的大国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主要国家与中间地带少数民族区之间的政治与外交关系,甚至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把中原中心与华夏边缘之间的半农业半游牧地区称为中间地带。<sup>②</sup>

国际学术界也主要是从地缘战略视角出发看待中间地带的,大致可分为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以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家为代表,如马汉、麦金德、豪斯霍弗、斯皮克曼、布热津斯基等,均依照欧亚大陆的中心与外围的分析框架,设计各自所在国家(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对外战略,其要旨是各大力量中心之间的那些中间地带(如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或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的控制权。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此处不再赘述。第二个分支从世界文明或文化的地理分布出发,指出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半岛(东亚、东南亚、南亚,涵盖古今朝鲜和日本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西部半岛(西欧,分布着古希腊罗马文明和近现代西方文明)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

<sup>①</sup>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刘建平:《“中间地带”理论与战后中日关系(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75—83页和《“中间地带”理论与战后中日关系(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78—88页;牛军:《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年)》,《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61—80页;牛军:《“第二中间地带”:1955—1965年的中国对西欧洲国家政策研究》,《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辑,2015年,第124—154页;翟强:《从隔阂到建交: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8期,第14—27,52页。

<sup>②</sup> 陈金凤:《三国争夺中间地带少数民族述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67—71页;陈金凤、姜敏:《南北朝时期北魏与中间地带蛮族合作探微》,《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68—72页;王鸣野:《“中间地带”的博弈与困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田文林:《大国博弈与中间地带的动荡与冲突》,《区域与全球发展》2019年第3期,第52—63页;王丽娜:《“中心”与“边缘”之间:中间地带的发现》,《读书》2019年第2期,第89—96页。

间地区”(intermediate region),它横跨非欧亚三大洲,从非洲经中东、东欧和高加索,到中亚、俄罗斯及其远东地区,分布着黑人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斯拉夫文明,以及其他文明或文化。<sup>①</sup>这个文化及考古学意义上的中间地区概念,由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希腊裔历史学家迪米特里·基齐基斯(Dimitri Kitsikis)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启发了后来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断层带”概念及“文明冲突论”。

在地缘战略理论的两个分支以外,若干国际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则从欧洲或全球均势角度出发,深入考察中间地带在大国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围绕拿破仑战争期间及其后维也纳和会上的大国之间的外交折冲,不厌其烦地详细交待英俄奥普法五大国对于中间地带及各个组成部分的每一次争夺、兼并和瓜分的方案、意图及谈判细节,包括莱茵联邦、德意志邦联、波兰王国等特定的中间实体(*corps intermédiaire*)的规模、性质和存废,以说明中间地带对于欧洲政治均势及欧洲体系稳定的重要意义。<sup>②</sup>此外,一些冷战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学者则主要使用第三世界或南方/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由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组成)两个概念,来描述或分析国际政治的中心地区以外的那些部分:前者对应于第一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第二世界(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后者对应于北方(由发达国家组成)。<sup>③</sup>

以上研究表明,中间地带是一个变动的、复杂的概念。实际上,在这个概念的“发明者”毛泽东那里,其内涵就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最初在1946年8月,毛泽东在思考中国革命未来前途时所说的中间地带,是指美苏两大力量之间的那个辽阔的地区,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欧、亚、非三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sup>④</sup>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重提中间

---

① Dimitri Kitsikis, *L'Empire Ottoman (Que Sais-j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5, p. 15.

②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③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关于“全球南方”的一项最新论述,参见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④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载《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62页。

地带时,这个概念是指两大阵营之间的广大地区,主要是亚非地区的那些独立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但同时又包括那些与美国存在分歧和矛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西欧国家。<sup>①</sup>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明确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概念,即“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不久又把第二个中间地带扩大到包括亚洲的日本、澳大利亚和北美的加拿大。<sup>②</sup>这个时期,毛泽东还提出好几个相近的概念,包括“间接同盟军”“中间集团”“中间世界”“中间势力”等,都是围绕如何立足于中间地带的这一个部分而争取另一个部分,从而形成“抗美援朝”国际统一战线。<sup>③</sup>在以上三个不同时段,毛泽东的中间地带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和一项战略设想,有若干共同特征:一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外交大局而设计国际统一战线的考虑;二是为国际统一战线而凝聚和动员党内及国内的战略决策共识;三是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的国际秩序想象,而不是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客观分析,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东风压倒西风”的战略判断和60年代中期推动“世界革命”的政治需要下,这种想象严重脱离了国际政治现实,给中国外交带来重大创伤。<sup>④</sup>

实际上,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决策者那里,在中间地带的认知和政策上,同样存在着主观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中间地带至少包含着地理、政治和历史文化三个维度,因而呈现出相当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迪米特里·基齐基斯所谓的文化考古学意义上的中间地区。但是,就冷战而言,中间地带是相关大国及其决策者的认知和政策所造就的,需要从政治和战略角度或大国关系视角去看待和分析中间地带,才能反映这个概念本身的基本内涵及政策指向。所以,从一般的国际政治定义出发,并结合冷战历史进程,本文所说的中间地带,是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要力量中心)之间的那些地区,以及在两个超级大国与几个次级大国(次级力量中心)之间的那些地区。它既包括传统的均势意义上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西欧与东欧),又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始终相互争夺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

① 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以及中英中美关系问题》(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58—162页。

② 毛泽东:《中间地带有两个》(1963年9月,1964年1月、7月),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9页。

③ 沈志华、李丹慧:《纪念毛泽东逝世30周年·晚年的外交战略:探索和矛盾》,《世界知识》2006年第17期,第20—24页。

④ 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27—31、346—349、409—411页。

(中东、东南亚、东北亚),还有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设想的、作为国际统一战线对象的地区及国家。在冷战时代的不同阶段里,中间地带的地理及政治组成、规模、重点,呈现出不同面相。世界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性,以及两大阵营内部分化的阶段性,推动中间地带的组成和规模不断发生变化。这是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变动性,也是它的第一个特征。

其次,中间地带是多重的,即不止一个中间地带,而是存在着多个中间地带。在冷战时期,如果仅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作为主要力量中心,那么,世界上似乎只有一个中间地带。但从冷战的阶段性看,在美苏两大力量中心以外,不断发展出西欧、日本、中国、印度等不同政治属性、不同力量等级的次级大国或次级力量中心,它们共同塑造着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图景,因而相应形成了若干个存在于两个或三个力量中心之间的中间地带,如在美苏、中美、中苏两个大国之间,以及中美苏、中美印、中苏印、美苏印等三个大国之间,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受到相互争夺的地区。这些不同的地区,都可以被称为中间地带。

再次,中间地带是复杂的。每一个中间地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上,在政治属性和战略作用上,都是不尽相同的。这主要取决于三项要素:地区大国的存在及数量、地区性的战略资源(石油、铜铁铀等矿产资源和海上通道)、文化及宗教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仅就地区大国的存在及数量或地区性力量结构而言,冷战时期的中间地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单极中间地带,如南亚(印度是唯一力量中心);多中心或松散的中间地带,如中东、东南亚(东盟成立前);紧密的中间地带,西欧、东南亚(东盟成立后)。因为各个中间地带不同属性和作用,大国对它们的关注程度和争夺烈度也是不尽相同的。

最后,中间地带对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及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有着很大的调适性与缓性和,此即一些国际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所说的中间地带对于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效应。中间地带是大国博弈(超级大国和次级大国)的场所,也是它们之间的缓冲地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测试和释放大国战略竞争/对峙的压力(紧张局势),进而使得大国战略竞争/对峙富有弹性,在整体上维持着国际体系的稳定。

## 二、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及效应：全球层次

冷战时期中间地带范围内的复杂多变的国际互动，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展开，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层次是美苏战略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以欧洲为重点，随后发展到全球范围；第二个层次是次级大国参与的地区性竞争与缓和；第三个层次也是地区性的，主要经由各个地区的地区大国在内政外交的巨变所引起。这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相互叠加、渗透或交织，共同塑造着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同时，这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大致以 1956 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和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及中东石油危机为分水岭，可划分为前后三个阶段。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或全球性力量中心在中间地带的竞争，是全球层次的国际互动。在第一个阶段，即从战后初期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随着冷战爆发和展开，美苏双方首先在欧洲展开争夺，然后不断扩展到中东、南亚、东亚；其中，双方争夺的重点是欧洲，核心是德国问题。<sup>①</sup> 双方围绕欧洲、中东和东亚（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重点地区）而发生激烈争夺，爆发了几场重大危机和热战，包括 1946—1947 年伊朗危机和希腊—土耳其危机、1948 年柏林危机、1950—1953 年朝鲜战争、1954—1955 年台海危机、1946—1954 年印度支那战争。双方还针对一些国家展开了包括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颠覆、政变在内的隐蔽行动，如美国在 1953 年针对伊朗摩萨台政府、1954 年针对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秘密行动，推翻了两地合法政府，扶植起亲美政权。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美国逐渐建立起一个从欧洲到东亚和拉美的、用来遏制苏联和中国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联盟网络，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1959 年改名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美澳新联盟，以及美台、美日、美韩双边同盟、美洲国家组织，从而取得了较大的优势。随着 1955 年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以及此前 1953 年朝鲜停战协定和 1954 年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协议相继签订，美苏及两大阵营基本上明确了各自势力范围的界线，冷战两极体制开始固化。

---

<sup>①</sup>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特赖希滕贝格认为，德国问题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的核心，随着德国问题的解决，美苏及东西方关系逐渐走向稳定与缓和。参见 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在第二个阶段,即从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到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及中东石油危机,美苏两国主要在中东和东亚两个重点地区进行争夺,并愈益走向非洲和拉丁美洲展开竞争。在中东,双方通过在第三、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各支持一方,大致划定了彼此的势力范围,美国巩固了中东北层的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三国以及沙特、以色列两个盟友,苏联将叙利亚、伊拉克、埃及纳入其战略轨道,并开始向红海两岸的南也门和索马里渗透。在东亚,美国为了遏制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先后以“多米诺”理论和“国家建设”理论为指针,长期支持韩国、菲律宾、印尼、南越等地的独裁政权,并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苏联(以及中国)则支持越南北方,形成长期的军事对峙。在非洲,随着一大批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而走向独立,美苏两国都不遗余力地移植各自的政治经济模式,双方甚至均为此诉诸于公开战争和隐蔽行动,导致阿尔及利亚、加纳、刚果(金)等国的政变、动荡和内战。在拉美,苏联支持古巴革命政权,并试图在古巴部署战略武器,从而引发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这次危机以及此前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推动形成了美苏危机管理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局势。美国为防止出现更多的古巴,继续通过武力干涉和隐蔽行动,颠覆拉美的进步政权,如1965年祭出“约翰逊主义”并出兵多米尼加共和国,1973年通过军事政变颠覆智利阿连德政权。

在第三个阶段,即从第四次中东战争到冷战结束,美苏争夺扩大到全球所有地区,尤其苏联愈益试图通过代理人战争确立、巩固和扩大其势力范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苏联测试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力量和底线,从此愈益将目光转向外围地区,愈益使用武力手段推行苏联模式;<sup>①</sup>而美国在结束越南战争以后,在欧洲以外地区推行“尼克松主义”,主要发挥其海外盟友或伙伴的“地区警察”的作用。<sup>②</sup>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夺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其中,在南部非洲,苏联及其代理人古巴与美国支持的南非和中国在1975—1976年安哥拉内战中针锋相对,各支持一支安哥拉武装力量;在东非之角,苏联、古巴、南也门支持埃塞俄比亚,美国支持索马里,在1977—1978年欧加登战争中大打出手,安哥拉、莫桑比克、坦桑尼亚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卷入其

---

<sup>①</sup> Jussi M. Hanhimäki, "Ironies and Turning Points: Détente in Perspective," in Odd Arne Westad, 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p. 326-342.

<sup>②</sup> 关于“地区警察”和“危机弧”,参见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pp. 197, 329.

中。从安哥拉到埃塞俄比亚,苏联的干涉规模和力度越来越大,而这两次干涉行动的成功,刺激苏联自信心大涨,终于导致1979年12月出兵阿富汗。20世纪80年代,美苏争夺态势逆转,美国奉行“里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尤其从南部非洲到非洲之角再到中东的“危机弧”地带),开始对苏联扩张主义采取攻势。其中,在阿富汗,美国及其西欧和中东盟友及伙伴,大规模地支持反对派武装,最终将苏联拖入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战争泥潭。在中美洲,美国强势介入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内战,打击亲苏政权或支持亲美势力,甚至直接出兵格林纳达,推翻亲苏亲古巴政权。同时,美国还采用“非对称”战略,利用其拥有极大优势的经济手段,在第三世界与苏联展开争夺。<sup>①</sup>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在全球争夺中败落下来。

在以上三个不同阶段,美苏对中间地带的认知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直接导致不同阶段的不同战略选择。在第一个阶段,美苏除巩固各自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以外,对其他地区均采取了有限卷入政策。美国根据民族自决原则,积极支持亚非地区的非殖民化运动。但与此同时,又以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态度,反对亚非国家的中立主义政策立场,竭力把更多的亚非新兴国家纳入美国战略轨道;苏联主要以周边安全为关切,主要在中东北层地区与美国(及英、法)展开争夺,同时有重点地支持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如中国、朝鲜和越南。在第二个阶段,美国从反对殖民主义和中立主义,转变到支持基于现代化理论的“国家建设”,愈益按照美国模式塑造新兴独立国家,甚至走到武装干涉的第一线(越南战争);苏联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和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一度对中间地带持有犹豫不决的态度。<sup>②</sup>但在1968年“勃列日涅夫主义”出台以后,愈益以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利益为名义,通过军事扩张手段输出苏联模式,以致许多亚非国家倒向苏联。在第三个阶段,美国先是奉行“尼克松主义”,采取收缩战略,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又转向价值观外交(人权外交),继而在80年代采取“里根主义”和“推回”战略,积极争夺中间地带的关键国家和战略通道;苏联继续向外围扩张,愈益依据中间地带和外围地区的特定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的一致性和忠诚度而采取行动,导致战略上的重要方向与次要方向

<sup>①</sup>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评析》(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71—372页。

<sup>②</sup>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p. 159; Contantine Pleshakov, “Studying Soviet Strategies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Cold War,” in Westad, 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pp. 232-241.

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承担越来越多的经济及军事义务。

美苏双方在中间地带的认知和战略选择上,有两大共同点:其一,美苏两国均从各自的意识形态标准出发,力图推广各自的政治经济制度,将各自“中意”的国家纳入其战略轨道或势力范围,而这种改造世界的使命感,导致双方在不同阶段均出现了战略重点方向与次要方向的界线模糊。但无论美国还是苏联,在前两个阶段,它们在拉拢或争取盟友或伙伴时,在意识形态标准上远非严格。在第三个阶段,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部分由于苏共内部的国际派或行动派在对外决策中开始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按照特定目标国及其不同领导人在马列主义纯洁度和对苏联的忠诚度的标准,决定是否援助或支持以及援助或支持何人,如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sup>①</sup>同样地,美国在卡特和里根执政期间,越来越重视盟友或伙伴国在国内政治尤其人权问题上的表现,逐渐放弃对美国海外联盟体系内的一些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的支持,推动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其二,两个超级大国均从地缘战略考虑出发,在核心势力范围之外,不断寻找、建立和控制越来越多的战略据点或战略通道,从而推动美苏战略竞争及冷战的全球化。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两个主要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的。在许多情况下,其他一些因素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如美苏两国的超强实力、不同领导人的个性、决策部门之间的竞争、官僚机构惯性机制,但它们往往是通过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两个主导因素发挥作用的。<sup>②</sup>

### 三、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及效应:地区层次

中间地带的另外两个层次的国际互动都是地区性。一个层次是美苏以外的次级大国或次级力量中心在中间地带产生的国际互动。这些次级大国或次级力量中心,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英国、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前殖民国家,它们在不同阶段与美苏及其他次级大国或力量中心产生互动;二是以中国、印

---

<sup>①</sup>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pp. 4, 110, 159, 169-170, 205, 259; Contantine Pleshakov, "Studying Soviet Strategies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Cold War," pp. 232-241.

<sup>②</sup> 关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对外决策要素及机制,分别有一项杰出的案例研究,参见 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v,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2nd edn., New York: Pearson, 1999; Vladislav Zubok and Con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rushchev*, rev. ed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度、欧共体(欧盟)为代表的新兴次级大国或力量中心,它们在第二、三阶段日益对全球及地区国际政治发挥重要影响。

次级大国在中间地带产生的国际互动,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因而导致中间地带的组成和规模频频发生变动。

在第一阶段,以英法为代表的殖民国家在东南亚、中东、非洲与美苏形成竞争与合作,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力量与美苏及英法形成既竞争又缓和的互动,其中,东南亚、中东是两个重点地区:一是美国与英法之间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局面,美国原则上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主义,但在遏制苏联和中国方面又要依靠英法两个传统盟友,以1954年日内瓦协议和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为标志,美国在东南亚和中东取代英法而成为两个地区的主导力量;二是苏联主要出于意识形态使命感而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从而与英法两国形成有限竞争,如苏联支持中国、印尼、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或摆脱西方统治的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后又通过中国支持朝鲜抗美援朝和越南抗法战争;三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力量逐渐进入国际政治舞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框架下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依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工原则走上与美国及西方斗争的第一线,卷入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印度以“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为抱负,力图发挥美苏以外的第三种力量的作用,调停朝鲜战争,组织亚非会议,推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亚非中立主义和亚非团结取得一些进展。

在第二个阶段,英法一方面专注于国内建设和西欧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与美国在北约军事指挥权、多边核力量计划、国际贸易与金融等方面产生分歧和矛盾,加上联邦德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在外交上奉行“新东方政策”,导致西欧日益成为一个次级力量中心和另一个中间地带。同样地,在美国支持下,日本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特需”机会,重返东南亚、加入联合国、积极开展对华外交,成为西方阵营内的重要成员和中苏两国积极争取的重要对象。同样地,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分化,中苏走向分裂,中国自身成为中间地带的组成部分和一个次级大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中国对外政策出现激进化趋势,在亚非拉地区积极推动世界革命,有重点地支持越南、阿尔及利亚、古巴、阿尔巴尼亚,而越南是重中之重,期望通过越南带动“东南亚

一大片”的革命。<sup>①</sup>但是,中国外交的激进化在两个中间地带均未取得显著成果:在第一中间地带,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而成功夺取政权的国家屈指可数;在第二中间地带,中国与法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但激进外交又“吓退”其他许多国家,甚至导致“四面树敌”。印度联合亚非欧的地区大国,发起不结盟运动,成立“七十七国集团”,有力地推动了第三世界的崛起,但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日益专注于南亚地区事务,并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前后实际上放弃了不结盟立场,在很大程度上进入苏联战略轨道。<sup>②</sup>在此后直到冷战结束的时期里,印度事实上只发挥了一个地区大国而非次级大国的作用。

在第三个阶段,西欧、日本和中国成为日益重要的次级力量中心,推动国际政治不断走向多极化趋势。在经济崛起的基础上,西欧和日本逐渐显露出政治及外交独立倾向,西欧不仅推动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而且日益在南北关系和全球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如1975—1989年期间的四个《洛美协定》,以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经济援助。日本以1977年提出“福田主义”为标志,在政治上重返东南亚,并开始向一些亚非拉国家提供大规模政府援助,在南北问题和全球问题上发挥作用。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三个世界”理论,逐渐放弃意识形态争夺或世界革命冲动,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在1982年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主动选择退出冷战,赢得越来越大的外交空间。<sup>③</sup>在这个阶段,西欧、日本和中国的立场和政策,为许多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战略选择,也使得东西方冷战愈益呈现出一种竞争与缓和并存的态势:在超级大国之间,竞争是主要的;在次级大国之间,以及次级大国与超级大国之间、次级大国与中间地带国家之间,缓和是主要的,而且推动了超级大国关系甚至整体上的东西方关系的缓和。

次级大国在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呈现出三个特点:其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十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与英法两个次级大国,同时在东南亚和中东两个中间地带形成复杂互动,以及美苏与中印在东南亚形成互动。但除此之外,在整个冷战时期,往往只是两个超级大国与另一个次级大国在其中一

① 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第339、349、372页。

② 关于第一、二阶段印度的对外政策,参见Odd Arne Westad, *The Cold War: A World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7, Chapter 16, “The Cold War and India,” pp. 423-447.

③ 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第545—556页。

个或两个中间地带形成竞争,如第二个阶段,美苏与中国在东南亚和非洲,美苏与印度在南亚;一般不会出现两个超级大国与多个次级大国同时在两个以上中间地带形成横向互动的情形;其二,超级大国与次级大国不会在前后三个阶段始终构成纵向互动,一般是两个超过大国在所有阶段进行竞争同时,而只在其中一个阶段分别与一两个次级大国形成竞争或合作,从而形成纵向的阶段竞争性竞争与合作,如第一、二个阶段美苏与中国在东南亚,第二个阶段美苏与中国在非洲;由于中苏关系与中美关系的变化,形成两个超级大国与中国在东南亚和非洲的竞争与合作相互交替的情形;其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西欧和日本作为新兴的次级大国或力量中心,愈益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它们与超级大国之间(美日欧三边关系、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对于中间地带各个组成部分的联动,以及整体上对于国际政治的全球性效应,也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这些新兴的次级大国或力量中心,本身也成为超级大国之间的愈来愈重要的中间地带。

另一个层次是中间地带的地区大国及其内政外交变化所产生的国际互动,这是地区大国对于国际政治的能动性。除中国和印度逐渐崛起为次级大国以外,在不同阶段,中间地带的一些地区大国的能动性,尤其内政外交的剧变,不仅对于地区形势产生了显著而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冷战体制的塑造(强化或削弱)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第一个阶段,土耳其在1952年加入北约、伊朗在1953年摩萨台事件后倒向西方阵营、印尼在1955年参与组织万隆会议并倡议中立主义和不结盟运动,均显著地影响了地区形势,前两者有助于加强冷战两极体制,后者则推动形成了国际政治中的第三种力量。第二个阶段,埃及在1956年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外交上倒向苏联并引发第二次中东战争,伊拉克在1958年发生革命并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印尼在1965年发生军事政变并倒向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使两大阵营的组成各有变化,但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冷战两极体制。第三个阶段,埃及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推动埃以和平进程并在外交上逐渐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一大支柱,沙特在中东石油危机后成为美国的重要经济伙伴和地区战略支柱,导致中东形势逐渐有利于美国;伊朗在1979年发生伊斯兰革命并在政治上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不久又爆发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而阿富汗在1979年底导致苏联武装干涉,使

得美苏在中东地区均面临更加复杂而微妙的形势。<sup>①</sup>

地区大国在内政外交或战略选择上的能动性,不仅改变了本地区的战略形势,而且推动超级大国和次级大国的战略选择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或缓和了冷战两极对峙关系。但是,地区大国所引发的两大阵营攻守态势的变化,其影响大致仅限于这些国家所在的地区,而很难外溢到其他地区或全球层次。例如,不结盟运动由于印度以及印尼、埃及和南斯拉夫等地区大国的内政外交变化,在70、80年代走向低潮,但并未引起全球国际关系的颠覆性变化。所以,一些地区大国在内政外交上的剧变,固然会导致两个超级大国以及相关次级大国的战略选择的变化,并导致两大阵营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的松动或强化,但并未在根本上改变或撼动当时的冷战两极体制。

#### 四、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地位和作用

在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中,美苏全球竞争是一条主线,次级大国与地区大国参与的复杂而多重的竞争与合作是若干条副线;美苏竞争与缓和主导并控制着次级大国与地区大国的能动性,次级大国与地区大国之间以及两者与超级大国之间在中间地带形成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对于塑造冷战体制(加强或削弱)有一定的助推作用,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从属性的。在这方面,只有中国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即中国不仅通过中苏分裂以及后来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互动,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从属成员向着中间地带的独立大国的根本转变,而且跃升为一个重要的力量中心。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对于两极体制的从属性,是超级大国、次级大国与地区大国各自的“权力优势”使然,也是冷战时期各个阶段的特定形势使然。<sup>②</sup> 由于超级大国的主导和控制,在整个冷战时期,分属于不同阵营的次级大国或地区大国彼此之间未能形成同盟或紧密合作关系,它们只有在改变阵营立场之后才能实现“想望”的结盟或合作,包括一个次级大国或地区大国倒向对立阵营的超级大国或形成事实上的同盟关系。例如,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谋求在中间

---

<sup>①</sup> 从更长时段看,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阿富汗的战争,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伊斯兰主义分别向美苏及冷战两极体制提出重大挑战。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Chapter 8, “The Islamist Defiance: Iran and Afghanistan,” pp. 288-330.

<sup>②</sup> 权力优势在大战略的“关联因素”中至关重要,梅尔文·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4—5页。

地带有所突破,形成针对超级大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或找到若干同盟军,但始终未能如愿,而仅限于与法国和日本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国只有在改善中美关系并推行“联美抗苏”战略之后,才得以实现与英国和以色列等美国盟友或伙伴的密切合作关系。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及第二次印巴战争中谋求美苏援助均不得,在第三次印巴战争前突然倒向苏联,事实上结成同盟关系。埃及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毅然绝然地倒向美国,最终才得以启动埃以和平进程,从而极大改善了自身的地区及国际地位。巴尔干地区的南斯拉夫也大致如此。<sup>①</sup>

中间地带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形式的国际互动,不仅充分展现了上文所论说的中间地带的变化性、多重性和复杂性,而且对于一般意义的国际政治运行富有一些启示。

首先,中间地带与次级大国或次级力量中心之间可能会发生相互转化。中间地带有可能产生新的次级大国,如中国和印度,超级大国各自控制的阵营内部也可能分化出新的次级大国或力量中心,如中国、西欧/欧共体和日本。另外,一些次级大国或力量中心也可能会沦为中间地带的组成部分,如英法两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和第三次印巴战争之后,大致在名义上是次级大国,而实际上是地区大国以及中间地带的组成部分。这些相对于超级大国的次级大国或次级力量中心,以及它们的战略选择,对于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在战略上意义十分重大。超级大国和次级大国关于自身及彼此的战略认知和政策选择,最直接的后果之一是各自会面临“两线作战”或“多线作战”的问题,如在冷战时期的第二阶段,美国面临着苏联和中国的挑战;中国不仅“两个拳头打人”去对付美苏两国,还要面临印度的挑战。在第三阶段,苏联不仅同时面对中美两国,还要安抚一个非常激进的古巴,以致不得不大规模地卷入安哥拉内战、欧加登战争,甚至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格林达纳;印度开始同时面临中美两国以及巴基斯坦的多重压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多个力量中心与多个中间地带之间的复杂互动,对于国际体

---

<sup>①</sup> 关于不同阵营的次级大国或地区大国相互之间未能形成结盟或密切合作关系的观点,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马骏副研究员的提示和启发,特此致谢。关于中国困境与战略选择的一项研究,参见马骏:《两极格局下的无奈与选择:毛泽东大战略思想研究——兼论毛泽东调整对美政策动机》,《国际观察》2008年第4期,第67—73页。在冷战两极体制和两个超级大国权力优势的约束下,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的有限能动性似乎是普遍的,其约束因素大致包括:超级大国的权力优势、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安全关切、意识形态立场。

系的稳定性来说,可能更加复杂、更加敏感、更加重要。

其次,超级大国和次级大国对于中间地带的认知,要尽可能从客观事实而不是主观愿望出发,例如,美国20世纪50年代对于中间地带的新兴独立国家及其中立主义立场的认知,以及中国在20世纪50后期到70年代初期基于阶级划分而对中间地带国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矛盾的战略判断,大致是脱离现实的,因而也是错误而无效的。同样地,意识形态立场或滤镜会扭曲乃至遮蔽客观事实,从而导致战略选择谬以千里。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排斥亚非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以及长期以来在盟国和伙伴国的内政外交上坚持双重标准,是不得人心的,也大致是得不偿失的;苏联和中国从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统性以及马列主义立场的坚定性出发看待中小国家政府或领导人,并由此在中间地带进行意识形态竞争,同样是不得要领的。<sup>①</sup>在摒弃意识形态、坚持客观判断的前提下,大国在对待中间地带国家的战略选择上,要保持一定的战略审慎,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战略审慎,是基于客观的认知和判断,这是大国与中间地带中小国家关系的起点,即客观地分析和对待双方而不是一方的利益和关切,以及更重要的是关于这些利益和关切的相互尊重,包括双方的利益、声誉和尊严;对许多中小国家来说,在很多时候,声誉和尊严也许比物质利益显得更加重要。战略选择上的灵活性,一方面,意味着从实际的、不断变化的形势出发,尤其要对许多中小国家内部事务的复杂性和变化性留下足够的时间与耐心;另一方面,是坚持手段的多样性和综合性,以及更重要地,在相互关系上留有余地。美国在伊朗、越南和安哥拉,苏联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中国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和东南亚,均留下了足够深刻的教训。

再次,中间地带域外的大国或力量中心,尤其是超级大国,不仅要在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问题上长期持有共识,而且要对中间地带的关键组成部分以外的外围地区(或遥远的边缘地区)保持一种温和节制的态度,在主要地区与次要地区之间划定并坚持明确的界线。经过1958—1962年激烈争夺的危机期,尤其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涉及各自势力范围或核心利益问题上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双方均不挑战对方

---

<sup>①</sup> Douglas J. Macdonald, "Formal Ideologies in the Cold War: Toward a Framework for Empirical Analysis," in Westad, 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pp. 180-204; 沈志华主编:《冷战国际史二十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1页。

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权威和利益,也不谋求在对方势力范围内进行政治渗透、武装颠覆或颜色革命,如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美国和西欧的“消极无为”,美苏对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控制。与此同时,美苏均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外围地区,而外围地区的极大的复杂性和巨大的不确定性,加上两个超级大国关于外围地区的对话机制的缺失,导致70、80年代美苏在中东、非洲之角、非洲中部及南部,愈益激烈地进行争夺,爆发了多场代理人战争,不仅直接消耗了两个超级大国及当地国家的国力,而且产生了至今仍未完全消除的后遗症。

最后,中间地带的地区大国的战略选择,在关键时刻、对关键地区,往往会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或消极后果。虽然这些地区大国及其战略选择,如上文所说不能从根本上撼动两极体制,但“四两拨千斤”的地区效应,以及对于超级大国和次级大国在政治上的心理冲击,却可能是经久而深刻的。例如,土耳其、埃及、伊朗、阿富汗和印尼,以及特定阶段的法国和日本,对于相关超级大国和次级大国及其战略行为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冷战时期的不同阶段,中国在对外交往上的几项显著成就,都有赖于这样的“四两拨千斤”效应,如印尼及其他亚非国家倡议召开的万隆会议对于中国周边外交新局面的开创,法国与中国建交对于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突破,日本与中国建交对于中国推动中美关系改善及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形成。同样地,中国外交关系上的一些挫折或教训,也跟一些地区大国的内政外交及战略选择的变化密切相关。例如,1965年印尼发生军事政变及倒向美国,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甚至影响着整体意义上的中国周边外交。从这个角度看,在全局高度和长远视野上运筹和经营中国与地区大国的关系,可谓至关重要。